

第一章 反卖国惩恶贼 五四起风雷

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①

——毛泽东

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封建军阀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大量地出卖国家权益，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内忧外患，日盛一日，民族危机，近在眉睫。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响彻云霄的春雷，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把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又一次推向了高潮。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阴霾笼罩着中国。巴黎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和会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犹如案板上的一块肥肉，遭受着列强的宰割。

在中国的东海之滨，有一座美丽的城市青岛，它坐落于黄海、渤海的要冲之地，帝国主义者对之觊觎已久。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于 1897 年 11 月 14 日借口山东教案（两名德籍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大刀会所杀），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

次年 3 月，德国又通过《胶济租界条约》强迫清政府将山东胶州湾地方租借给它，并攫取了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并在铁路沿线开采矿产的权力。

这样，山东省便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也全然成为“国中之国”。

1914 年 7 月，当德国人正在青岛这个避暑胜地寻欢作乐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先后卷入这次世界大战的有 33 个国家。战争双方为奥、德的“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的“协约国”集团。日本、意大利、美国在战争爆发后陆续参加到“协约国”方面作战。

日本参战的目的，是想趁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事，无暇顾及东方的机会，扩大在中国的侵略。于是，日本于 1914 年 8 月 23 日对德宣战并于 11 月占领了青岛。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为日本人所取代。

然而，夺取山东只是日本侵华战略的第一步，它还要独占全中国。

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窃国大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了避免引起第三国干涉，日置益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

曾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①

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不仅会遭到第三国的干涉，还担心遭到本国人民的反抗，所以袁世凯政府一再请求日本“原谅中国政府实在为难情形，勿过坚持”，“请留亲善余地”。^②

日本根本不满意袁世凯政府的犹豫，对袁世凯进行军事恫吓。

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于5月9日承认了“二十一条”。然而，袁世凯却没有坐稳皇帝的宝座，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了。

1917年，府院之争以后，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了北京的中央大权。8月24日，段祺瑞政府宣布对德作战。

按道理讲，中国既然对德宣战，德国在山东夺取的权益，应该由中国收回。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1918年9月24日，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

换文实质进一步承认了“二十一条”，而且根据换文，日本获得的山东权益大大超过了“二十一条”规定的范围。中国参战的结果，不是将山东收回，而是进一步丢弃，这实在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但是，已经彻底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段祺瑞政府，不仅不感到耻辱，反而允许其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在换文上签了“欣然同意”的字样。这份“欣然同意”的换文，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就成了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又一借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73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广大的中国人民表现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和信心。这一方面，固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一种错觉或幻想扭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公理战胜强权”。正如陈独秀所说：“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①“公理战胜强权”，当时之所以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同北京军阀政府的竭力鼓吹不无关系。

早在一战结束的第五天，11 月 16 日在北京政府向全国发布的“大总统令”中，就这样写道：“比者天心厌乱，欧战告终，我协商国兵士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②军阀政府鼓吹这种论调，是为了掩饰其卖国的累累罪行，炫耀其对德宣战的功劳，借以提高自身威望。而在“公理战胜强权”的一片喧嚣声中，这种卑微的目的，也暂时地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11 月 30 日，北京学界举行提灯游行，竟有不少人跑到段祺瑞住宅门前表示祝贺。

中国人民正是怀着“公理战胜强权”的渴望，关注着在巴黎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

但是，公理果然战胜了强权吗？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在巴黎的凡尔赛宫正式开幕了，这是一个分赃会议。

参加巴黎和会的有三十多个国家，但实际上，是美、英、法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第 2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3 月版

② 同上书，第 25 页。

意、日五个国家，特别是美、英、法三个国家，操纵着会议。

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所组成的“四人会议”，是和会的决策机构。意大利因为本国要求未达到，而中途退出了会议。一切重大问题，都由英、法、美三国决定，其他国家只是在讨论到与其有关的问题时，才能列席。

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有五人。首席代表是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其余的代表为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陆徵祥为历次与日本签订密约有关之人，而代表团亲英美派居多，所以陆徵祥到巴黎后不久，便于 2 月 10 日提出辞呈未准，旋又称病于 3 月间赴瑞士，至 4 月 5 日始返巴黎。

因此，列席最高会议的代表经常是顾维钧、王正廷二人。

巴黎和会开始时，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七项希望条件：

- 一、废弃势力范围；
- 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
- 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
- 五、归还租借地；
- 六、归还租界；
- 七、关税自由权。^①

中国留欧学生密切注意着巴黎和会。他们结成团体，派出代表，要求中国的外交代表必须向和会提出废除“二十一条”。

在此情势下，中国代表又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要求。

两项提案刚一提出，就被和会的最高会议挡了回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山东问题能够顺利解决。

1月17日，和会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列席。

在会上，尽管中国代表反复陈述了应将胶州地界、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理由。但日本代表却坚决拒绝。

1月25日，和会上再度讨论“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列席会议，并申诉理由，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各方面说明：“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①

日本代表继起发言，说：“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属领；然而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②

中国代表接着发言，说中日间的密约，中国是被迫订立，而且是一种临时办法，应该由和会作最后之审查来解决。中国代表发言后，第二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便结束了。

会后，日本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

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奉命到中国外交部质问，指斥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消息传来，怀着“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人民，犹如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全国舆论激愤。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中这样写道：“难道公理战

^②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①

2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北河沿法科学堂召开全体大会，对日方代表在和会上的蛮横态度以及小幡公使的无理质询，表示严重抗议，并推举干事联络各校学生，拍电报给和会的中国代表，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

从2月初到3月中旬，全国各地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抗议。有的致电北京政府说：“鉴日人于巴黎和平会议对我国代表提案权无理干涉，闻之发指，恳速电代表始终坚持，誓竭此力为外交后盾。”^②有的电文要求北京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恃强干涉，应“严词拒绝，……勿甘屈服。”^③

有些省的议会也发出电文，表示抗议。甚至有些前清的京官也以“绅民”的名义，发出通电。此外，海外华侨，如侨居英、法的工商学界，也纷纷通电抗议。这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包括各阶层的、以通电形式表现出来的抵抗运动。

在这些通电中，还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另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废除中日一切密约，尤其是1917年高徐、顺济铁路密约。因为这正是日本持蛮横态度、有恃无恐的“依据”。

山东外交商榷会发函通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擅与日本订胶济及高徐、顺济路正约，违法卖国，莫此为甚，鲁省人民愤激万状。多请废弃以保主权。”^④

正当人们要求废除密约并开始把愤怒转向卖国贼的时候，上海报界接到了和会代表王正廷来电，声称：“我国和会提案，注重废二十一款及诸密约，……而国人竟有因受诱济私者，事

陈独秀：《公理战胜强权》，《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2日。

②③④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第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

同串卖，有若大逆，望率全国舆论一致严诛。”^①

该电一公布报端，就如同火上浇油，立即在各阶层中引起巨大震动。人们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签订这些卖国条约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身上。

4月11日，章宗祥请假由日本回国，据说日本人像送丧似地在章宗祥所乘坐的火车车厢里挂满了白色的膏药旗。

当时，三百多中国留日学生，赶到火车站，把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地向车头掷去。

4月16日，上海民议联合会、华侨平和期成会、华侨联合会、对日外交后援会、上海救国团、四川旅沪同乡会、陕西旅沪同乡会等团体的代表，召开救国联合大会。

在大会决议中，公开点了这些卖国贼的名，指出“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②

4月20日，直接遭受祸害的山东人民十万余人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

大会在致巴黎和会代表的通电中表示：“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激愤，……誓死抗争，义无反顾。”^③

4月22日，巴黎和会召开大会，中国代表被邀出席。

在会上，威尔逊表示无能为力，并质问中国代表说：“1918年9月当时，协约军事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

②③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第29页、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

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指山东问题换文——编者）？^①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提出两项办法：一为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一为按照中日成约办法，由中国任择其一。两项办法实际上是一种办法，那就是牺牲中国。

劳合·乔治并且向中国代表表示，“现为条约所拘束，殊无可奈何。”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则接着说：“英总理所言，亦即完全为我之意。”^②

4月24日 中国代表另备说帖 分送美总统及英、法总理，提出四项办法：

- 一、胶州为交还中国起见，先交五国暂收；
- 二、日本承认于对德和约签字日起一年以内实行上条之交还；
- 三、中国重视日本因胶州军事所有费用等，愿以款项若干作为报酬，其数额由四国公决；
- 四、胶州湾全部开作商埠，如有必需之处，亦可划一区域作为专区，任缔约国人民居住通商。^③

然而，即使是做出这样极大让步的办法，也被拒绝了。

4月29日 英、法、美举行三国会议 日本代表被邀出席。

30日，三国会议议定了关于山东省问题的下列条款（摘

^{①②}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第29页、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256页，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要):

第一五六条，德国将按照 1898 年 3 月 6 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所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固定及行动机件，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随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七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八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项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经过数个月的讨论，中国一无所获，日本的要求都获得了完全的满足。至此，中国在和会上完全失败了。

令人气愤的是，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然考虑签字了。

陆徵祥在 5 月 1 日致大总统、总理的密电中竟说：

有三端关系，亦不能不加熟审：一，对日关系，公约虽不签押，而日本仍可根据 1915 年约，向我直接请再定约，将举所允日本之条件，完全承认。倘彼时势仍不能不签，则较之现在公约签字，事实则一，威望更逊。二，对德关系，倘单独与德订约，则所得权利能否比公约所许为优。三，对英法美关系，此次经三国讨论数日，而结果仍然如是，在我虽属不平，而在彼亦有种种苦衷，难免不于彼我感情因此妨碍，且于日后一切亦不无多少之关系。^①

北京的春天，风沙扑面，使人心情低落。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新闻传来时，人们更加烦躁不安。

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被披露于报端 噩耗得到了证实。

5 月 1 日上海《大陆报》上说：“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②

5 月 2 日，身为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他说：“胶州亡矣，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③

他的文章虽未谈及噩耗的具体内容，人们对巴黎和会上的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 258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 月版。

^{②③}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第 32 页、3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3 月版。

完全失败，已深信不疑了。

5月2日，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上，人们不约而同地议定“五·七”举行大示威，并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当时应采取的步骤。

5月3日晚，北大全体同学和北京其他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齐集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北京大学）召开会议。一些老师和同学在会上发言。发言者痛哭淋漓，与会者掌声雷动。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扯下衣襟，上书“还我青岛”四字。这一举动激励了与会者的情绪，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表现出一种凄凉与悲壮气象。会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举行全体游行示威。

连同这一决定，大会共议决四条办法：“（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①“同时举代表到各国（日本以外）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及其决心”。^②

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银元、钞票、铜子以及手表、戒指、头巾、帽子等，都纷纷捐掷到台上来。大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极点。

“五·三”之夜是一个不眠之夜。

会议结束之后，学生们更加忙碌地分头筹备起来。他们有

^{①②}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

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标语等，有人甚至热情地把床单扯作旗帜用。

5月4日的黎明到来了。

上午10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大学、警察学校、农业部门、医学部门、铁路管理、税务学校、汇文大学、法政部门、民中大学等13所学校的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部门学校开会，讨论研究下午有关游行的具体办法。会议结束时已近中午，代表们急忙赶回学校，准备下午的游行。

5月初的北京，虽刚入夏，但时近中午气温已有些燥热了。可是在民族危亡关头，广大青年学生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都比5月的骄阳还要炽热。

下午一时左右，北京13所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因受到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和几个警察的拦阻，是最晚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各校学生，热情地向他们欢呼。

这天来参加集会游行的学生多数身着长衫，也有的穿着黑色制服，人人手中都拿着小旗，上面写道：“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勿做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等等。

有的标语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也有的旗子上画着漫画。最引人注目的，是竖在金水桥南边的用长方形白布写的一幅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边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②

当天晚上，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还我青岛”的那块衣襟也悬挂在天安门前，很是激动人心。

冲破了军警的拦阻，集会宣布开始了。

一位北大学生代表，宣读了事先由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济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 273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 月版。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第 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3 月版。

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德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①

学生的呼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学生的行动，感染了各界市民。许多市民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来。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直奔东交民巷而去。但反动派早已有所准备，命令所属巡捕将游行队伍阻于铁栅栏之外。学生将预先准备好的有关山东问题请求美国在“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的《陈词》交给美使馆。

被阻于东交民巷的三千多名青年学生，在烈日下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同学们深深感到：“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②

学生们怒发冲冠。当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 275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 月版。

② 同上书，第 281 页。

曹汝霖家去！”时，游行队伍齐声响应，改道向曹汝霖家涌去。

曹汝霖、章宗祥在当天中午就知道了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但他们却无视学生的力量，认为武装的军警完全可以将赤手空拳的学生镇压下去，两人于下午二时许毫无顾忌地呆在曹宅。

学生们边前进，边宣传，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他们热情充满、汗泪融合的共同表现，感染了围观的群众，连有些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也只是拖了枪支，漫无目的地随众前行，有的甚至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4 时左右，游行队伍呼声震天，以排山倒海之势拥到了赵家楼胡同的曹宅门前。曹宅大门紧闭。门前由三四十个警察守卫着，无法入内。

学生们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他们一面与警察争执，一面绕屋而行，寻找破门之路。

学生究竟是怎样冲入曹宅的呢？

一个首先冲入曹宅的学生回忆说：

当走到曹宅前面的时候，大多数的学生都从墙外把所持的旗帜抛入墙内，正预备着散队回校时，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这时曹汝霖宅内的十几个全身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呼声鼓掌声所震慑，并且受了跳进去的同学的勇猛的感动，已丧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刃，退出装好的子弹，让继续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后门打开之后，

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①

学生冲入曹宅后，首先冲入前面大厅。

厅内空无一人。学生一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家具抛出窗外，墙上悬挂的日本天皇像被狠狠地摔碎在地上。学生没有找到曹汝霖，却发现了章宗祥。章宗祥被打得满面是血，躺在那里犹如死了一般，后被日本人护送到同仁医院治疗。

学生到处搜寻曹汝霖，始终未见他的踪影，却碰到了曹的父亲和曹妾苏佩秋，但并未伤害他们，而是让警察带出去了。

寻不见曹汝霖，学生们气愤异常。为了惩治卖国贼，学生们在曹的内室放了一把火。曹宅顿时陷入一片火海。浓黑的烟雾中，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地向上冒。这时，学生们才开始散去。

曹宅起火后半个小时，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太率领大批军警气势汹汹地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脱的被反动派逮捕，共 32 人。

学生被捕后受到虐待和凌辱，“既到警厅，三十二人共住一房，如待贼寇，看管颇严”。^②

用示威游行的激烈斗争方式来反对内外反动派，在中国历史上还属罕见。这发生在五四革命风暴之前，使北洋军阀政府极度恐慌。他们连夜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

而与此同时，北京各校的学生也在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

5 月 5 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宣布总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 283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 月版。

② 同上书，第 289 页。